

关于认知符号学的思考：人文还是科学？*

赵毅衡

摘要：近年来，认知科学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覆盖面巨大的伞形术语，符号学运动中也产生了认知符号学分科。检查该学科的发展史，可以看到皮尔斯在为符号学奠基时，就已经极端强调认知与解释了。目前的认知符号学，应用某些认知科学的方法，更加强调符号学原有的认知倾向。但是如果让符号学朝脑神经心理学方向靠拢，就会失去符号学的人文本色，这对符号学的发展反而不利。

关键词：符号学，认知，脑神经学，人文

Cognitive Semiotics: Humanities or Science?

Zhao Yihe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ognitive science has rapidly developed into a vast umbrella term, giving rise to cognitive semiotics. An examination of its genealogy reveals that C. S. Peirce emphasised cognition and interpretation at the very founding stage of semiotics. More recently, cognitive semiotics has focused more on the tendency towards cognitivity, which employs some of the methods of cognitive science. Nevertheless, semiotics may lose its characteristics as a discipline within the humanities if it is allowed to approach neuropsychology too closely. This trend could be undesirable for its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中期成果之一。

development.

Keywords: semiotics, cognition, neuropsychology, humanities

DOI: 10.13760/b.cnki.sam.201502007

一、恐怖的不对称

认知符号学 (cognitive semiotics) 这个术语不对称, 这不是前后位置问题, 改称符号认知学 (semiotic cognition), 意义相同。不对称是因为“认知学”这个潮流太宏大: 自从五六十年代肇端, 70 年代发展成一个学科, 80 年代发展成一种总方法论, 90 年代成为人类思想的四大领域之一, 衍生出几十个学科, “认知科学”成为一个巨大的伞形术语, 被认为是 21 世纪人类思想发展的引领者。在各种学科中, 都出现了“认知转向”, 原因很简单: 认知科学看起来正在接近解决宇宙的最大秘密: 人的心灵 (mind) 是如何构成的。

难道先前人类没有试图破解心灵这个谜吗? 当然思想界一直在努力, 只是一直没有定论, 古人就在这问题上冥思苦索, 柏拉图论理念, 孟子论心; 到现代, 自从笛卡尔、休谟、康德之后, 给出的谜底越来越多; 到 20 世纪更是一家一说, 心灵之学成了众声喧哗之地。但是 20 世纪下半期, 出现了两种新工具, 彻底改变了人类探索心智难题的方法途径。其一比较不起眼, 那就是脑成像技术, 我们能用各种方法直接看到脑子各种区域在活动时的“分工”, 在接受刺激以及思考时的活动激烈程度, 这给脑神经生理学一个巨大的突破。第二种方法的影响面更大, 那就是计算机技术。原先只能靠实验心理学做近似的测定心智, 或靠哲学虚拟地设想心智的工作方式, 现在人工智能科学却能一步步逼近心智本身: 人类渐渐能设计出具有“认知”功能的机器。这两者, 一者看到人脑, 一者制造人脑, 使心智之学突然变得极为现实, 认知科学突然变成 21 世纪整个世界科学突破的领头羊, 人类即将进入认知世纪。

由此, 许多学科, 都以“认知”为名, 都以“认知转向”为新的发展前景。在这背景上, 认知符号学的出现, 一点不令人惊奇。让人惊奇的是为什么到 90 年代才出现认知符号学这个想法——1995 年美国的托马斯·达代西奥 (Thomas Daddesio) 在《论心灵与符号: 认知科学与符号学的关联》(*On Minds and Symbols: The Relevance of Cognitive Science for Semiotics*) 中首先提出这门学科的名称。难道符号学不是一直在追索人类心智的秘密? 符号是用来表达、发送、解释意义的, 符号学就是意义学, 而意义就是人的主观与客观的联系, 是心智存在的理由。因此, 认知符号学不是一个新的符号

学，而是符号学的某个方向得到进一步的强调。瑞典隆德大学的兹拉台夫（Jordan Zlatev）对此有一段非常有趣的话：

认知符号学不像生物符号学、社会符号学那样，不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认知符号学不像视觉符号学、文本符号学那样，不是符号学的一个模式。

认知符号学不像皮尔斯符号学、索绪尔符号学、格雷马斯符号学那样，不是符号学的一个流派。

认知符号学不像存在符号学那样，不是符号学的一种理论。

认知符号学是符号学的一个新的时髦吗？也不是。因为很多符号学者在做认知符号学，却没有自称“认知符号学者”。回顾一下：实际上索绪尔、皮尔斯、艾柯、霍夫迈尔都是认知符号学者。（Zlatev, 2011）

那就让人十分纳闷了：认知符号学究竟是什么？或者应当更清楚地问：认知符号学究竟目标是什么？

二、符号学本来就是认知符号学

因此，我们必须给认知符号学一个清晰的定义，不然就像堂吉珂德战风车。兹拉台夫认为，认知符号学不是一种跨学科的学科（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而是一种“超学科的学科”（transdisciplinary discipline）。这话具体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是认知学与符号学两种学科的融合，不是只讨论两个学科的叠合处，它是超越这两种学科之上的一种超级学科。这个说法很堂皇，却并不解决问题。

究竟认知符号学研究什么呢？兹拉台夫有一个定义：“认知符号学……聚焦于‘意义’这个多面性现象。”这个定义与“符号学”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任何不同。索绪尔说“研究符号作为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的作用的科学”（Saussure, 1959, p. 14）。固然今天还有人坚持索绪尔的古老定义，把符号学定义为“研究符号的学说”（Cobley, 2010, p. 3）。但是越来越多的符号学家赞同：符号学作为一种对普遍意义活动规律的思索，目的就是为了理清人类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符号被认为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符号不仅是表达意义的工具或载体，符号是意义的条件，意义不可能脱离符号存在。

曾经有某些论者认为符号学的研究重点是“表意”（Bronwen &

Rinham, 2006, p. 119), 即意义的发出 (articulated meaning)。例如怀海德的意见是:“人类为了表现自己而寻找符号,事实上,表现就是符号。”(Whitehead, 1928, p. 62) 福柯在他 1969 年关于认识论的名著《知识考古学》中说:“我们可以把使符号‘说话’,发展其意义的全部知识,称为阐释学;把鉴别符号,了解连接规律的全部知识,称为符号学。”(Foucault, 2002, p. 33) 他的意思是符号学与阐释学各据意义活动的一半,相辅相成。福柯这个看法基于 6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索绪尔符号学,实际上符号学的重点早就已经转到意义的接收端。

符号学应当被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在 19 世纪末与皮尔斯一道建立符号学的英国女学者维尔比夫人 (Lady Victoria Welby) 就建议符号学这门学科英语应当称为“sensifics”,或“significs”,即有关 sense 或 significance 的学说,也就是“表意学”。她言简意赅的名言是:“符号的意义来自意义的符号。”(The Sense of Sign follows the Sign of Sense.) (Petrilli, 2009, p. 109) 近几十年来,皮尔斯的符号学代替了索绪尔的符号学成为世界符号学运动的主流,原因是皮尔斯注重符号的意义解释,他的名言是:“只有被理解为符号才是符号。”这本是符号学应有的形态。因此,皮尔斯式的符号学,就是意义学,就是着重于认知的符号学。

至今符号学界没有采用“符号学即意义学”这个定义,可能是考虑到讨论意义的学说太多,例如认识论、语意学、逻辑学、现象学、解释学、心理学,以及我们面临的“认知科学”。如果说这些学科也在研究意义问题,那么就应当说,符号学着重于研究意义的普遍形式,符号学就是意义形式的哲学。(赵毅衡, 2014a)

符号学一直在关注认知的作用,符号学讨论的问题,有许多实际上是认知问题。例如文本—伴随文本—全文本问题,因为文本的边界,一直是认知,而不是表达所决定的。^①(艾柯, 1997, p. 78) 例如符号学讨论意义的多重环节,而接受者的解释意义是最终能“当下化”的环节(赵毅衡, 2010); 例如符号学也讨论在社会性的使用中,符号的意义理据性如何不断上升(赵毅衡, 2011)。学界早就在讨论的体裁与其特定的“阅读期待”问题,更是个认知“图式”(schema)问题。(Culler, 2002, pp. 87-98)

符号叙述学,也一直在讨论一系列的认知问题,例如为何“二次叙述”

^① 艾柯指出:“文本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解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解释在论证自己合法性的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被证明的东西成为证明的前提。”

才是决定叙述的环节（赵毅衡，2014b，pp. 121-127），阅读中如何用脚本与混合脚本（blending scripts）来理解超自然灵异故事（Alber，2009），普遍隐含作者与不可靠叙述的“认知确定”为何比“修辞确定”更为可靠，等等。而近年欧洲叙述学家关于“自然叙述学”的激烈辩论（Fludenik，1996，pp. 9-38）完全属于认知学的范畴，因为“认知诗学就是关于文学作品的阅读”（Stockwell，2002，p. 13）。

而意义理论对意义的最根本定义，即“主观与客观的联系”（赵毅衡，2015），这与认知符号学“把意义看作人类主体和世界之间真正联系的基础”（Simonsen & Vang，2008）异曲同工。意义理论讨论为什么区隔与展示是任何认知行为的最基本条件，与认知学的图式观念密切相关。可以称以上这些思考为符号现象学，也可以称之为认知哲学。

以上我所举出的，只是人所共知的大者。可以说，符号学，尤其是延续至今的“皮尔斯式符号学”，实际上一直是认知符号学，而皮尔斯本人实际上是最早认真地讨论认知问题的理论家之一（Stephens，1981）。“认知符号学”这个名称，对于当今的符号学运动来说，实际上是同义重复。胡壮麟在总结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时指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认知学在中国学界就等于“认知语言学+皮尔斯符号学”。（胡壮麟，2013）

（一）符号学的“认知转向”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看来很奇怪的结论：对于许多其他学科来说，“认知转向”是切切实实正在出现的重大变化，而对于符号学而言，并不存在“认知转向”的问题，而只是进一步肯定符号学运动近半个世纪年来前行的方向。

如果说符号学运动也正在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正在发生的，并不是符号学的“认知转向”，而是符号学的“认知科学化”，也就是符号学采用认知科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尤其是量化社会调查、实验室技术，甚至包括脑神经学的注重测量技术与成像技术，以及最终与计算机科学的前沿，即人工智能相结合。认知科学绝对是基于量化测试的心理科学，因为认知科学当代勃兴的基础是信息技术，并“进一步为信息科学技术的智能化作出巨大贡献”（史忠植，2008，p. 5）。认知科学据说是整合了六大学科——哲学、语言学、人类学、心理学、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但是切切实实的学科基础是最后两个，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

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发表60页的长篇报告，认为21世

纪四项最重要的科学技术，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而认知科学是前三者的前导。注意这里不是说对人文学科的领头，而是对几种最前沿的技术发展方向的领头。由此才出现几乎百种学科无不“认知”的局面。

而直接能从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这两个学科得益的，是心理学。其结果是新出的认知化“心智哲学”成为“心理哲学”，即哲学的心理学化；“认知语言学”成为语言心理学；人类学转化成“心理人类学”。这种不对称的压力，也在其他人文学科中出现，例如逻辑学的认知转向，即是“在实验科学基础上的思维形式科学”，其目标是“给出知识的获取、表达、扩展、修正的认知模型和方法”。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的分析，发现认知模型，并且构造描述认知模型，具有人工智能的应用前景。正因如此，认知逻辑学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结合得很紧。

甚至符号学一旦出现“认知转向”，也就会渐渐实验室化。例如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张杰教授于2005年在《文艺报》就提出语言学与文学理论“从‘形式’转向‘认知’”（2004年12月16日）。浙江大学传播学院李思屈教授提出：“传播符号学发展的三种趋势重要动向”，其中之一即是传播符号学与应用性学科和自然科学的科际融合（2013）。他说的“自然科学”就是“认知神经科学”。国外也不例外。由美国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创办的《认知符号学》（*Cognitive Semiotics*）杂志，现在由丹麦的阿尔胡思大学（Aarhus University）主持。早在2009年，在我国坚持认知符号学最长久的胡壮麟教授，对该刊今年的文章作了一个出色的总结，认为该刊的宗旨是：“力图整合认知科学、符号学与人文学科的方法和系统。”该刊多年来刊登了不少文章，讨论的问题介于实验语言心理学与符号学之间。国外和国内一系列大学，渐渐把认知符号学研究放在“心理实验室”里。

所以，虽然符号学历史上一直在做认知研究，符号学的“认知转向”却不是延续符号学传统，也不是有意识地加强这个传统。“认知转向”，实际上是“认知科学化”，有些学府则进一步讲符号学“心理实验室化”。

1. 何为认知符号学？

那么，符号学应不应该进入心理实验室？应当说，知识和学术的发展，不由个别人的偏爱而决定。学术发展，既是整个世界学术界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学术发展的历史需要决定的，任何思想者，只能在这个背景上作出一些贡献。所以不应当讨论某个学科应该如何如何发展，对一个学科发展的

方向指手画脚，只能显出自己的可笑，只应该探讨一个学科可能的发展趋势。

心理学自从19世纪兴起以来，与人文学科，一直处于纠葛与分合之中。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的思想，并非19世纪末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思潮的新发明。自然法学派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启蒙学者，苏格兰学派的主将休谟、斯密，功利主义者边沁、穆勒等无一不援引“人性”与“心理科学”，作为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他们讨论的问题，有许多是在为现代心理学奠基。

但是现代心理学的兴起，对思想界的冲击极大。19世纪下半期，心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许多领域大行其道，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冯特创始的实验心理学，研究人的内部心理过程，被公认为认知心理学的先行者，当时影响之大，引发出一个以心理学的解释取代物理的与生物论的解释的普遍倾向。与冯特同代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布伦塔诺，成为现象学的铺路者。而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格式塔心理学，以其强势而证据清晰的实验，直接刺激了形式论诸学科的出现。

在上个世纪之交，与心理学之间的纠葛，已经成为哲学界和思想界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19世纪90年代起，一大批理论家声称“社会的事物没有不同时是心理的事物”。胡塞尔的第一部著作《算术基础》（1891）被批评为“心理主义”，而几年后出版的《逻辑哲学》第一卷（1900）反驳自己的心理主义，明确声明“任何把认识论建立在心理学或其他自然科学上的做法，都是一种背谬”，这才真正开创现象学（周枫，2004）；新批评的奠基者瑞恰慈，曾经声称“神经科学完成之时，就是所有的文学问题得到解决之时”；新批评派本身就是摆脱心理主义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立足点，兰色姆（Ransom）在《新批评》（1941）一书中对前辈的共同指责就是心理主义，尤其批评瑞恰慈是“心理主义者”；符号学的创始者索绪尔提出的符号文本构成的“双轴理论”，至今是索绪尔遗产中最有用的部分，但是索绪尔把其中之一称为“联想轴”，被他的后继者批评为“心理主义”，马丁奈改称“聚合轴”，雅克布森改称“选择轴”，就是为了摆脱心理学色彩。

上个世纪转折时，形式论与现代意义哲学的形成，一直在为摆脱心理学影响而挣扎。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又重新面对心理学的压力，而且几乎是同一种心理学：认知实验心理学。不同的是，这种心理学现在具有比百年前冯特心理学强大得多的实验工具和量化手段，那就是脑成像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也有着比百年前更神圣的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性目标，那就是人工智能。当年索绪尔、胡塞尔、瑞恰慈等禁不住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吸引，我们今天面临

再一次“认知转向”，恍如昨日。

2. 没有“认知转向”也会有认知符号学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符号学无须“认知转向”，因为符号学运动一个世纪的发展，除了20世纪60年代过于强调文本的结构主义阶段，一直就是认知符号学。

因此，符号学的“认知转向”，只是符号学进行的一次自我审视，或是心理实验化，二者都不容易做到。这就解释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无论中国还是全世界，认知符号学已经繁荣了十多年，尽管出版了许多散篇文章，成立了专门研究机构，《认知符号学》专业刊物出版了7年，却至今尚未产生一本《认知符号学》。唯一的一本单印本《认知符号学》，只是十年前出版的一本文集，多少天才的头脑倾注于此，却至今未有一本系统的专著。（Brandt, 2004, pp. 2-3）无独有偶，“后经典叙述学”的领军人物赫尔曼（David Herman）正式提出“认知叙述学”（2003, p. 27）这个概念已经提出十多年，至今依然没有一部成体系的《认知叙述学》。

这个局面的确很奇怪，因为“认知转向”几乎在各个学科中发生，而且无往而不利，无坚不摧。十年来我们看到几十部认知心理学著作，也看到十几部认知语言学著作（包括语法、语义学、翻译、语言习得、课堂教学等），这容易理解，因为哪怕在“认知转向”之前，心理语言学也一直是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也读到认知科学应用于各种学科的专著，《认知诗学》（*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by Reuven Tsur, 1983）最早出现，此后各种科目跟上，例如《认知风格学》（*Cognitive Stylistics*, by Elena Semino, 2002）；《认知文艺学》（*Cognitive Science, Literature and Art*, by Patrick Colum Hogan, 2003）；《认知艺术学》（*The Artful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Riddle of Human Creativity*, by Mark Turner, 2006），甚至《认知建筑学》（*Cognitive Architecture*, by Deborah Hauptmann et al., 2010）。哪怕认知学的著作已经汗牛充栋，要写出一本不同于主流符号学的《认知符号学》，却变成了大难事，因为找不到与主流符号学的差异，就很难证明这样一个体系的必要性。唯一的一本《电影认知符号学》（*The Cognitive Semiotics of Film*, by Warren Buckland, 2000）实际上是一本认知学的电影研究。

本文并不是反对“认知符号学”的兴起，相反，本文的目的就是想为这样一个困难任务清扫基地。而且，上面列举的认知学一显身手的应用领域，实际上也是符号学一直在工作的场地，例如认知音乐学，实际上是从音乐符

号学发展过来的。就拿妙趣横生的《认知魔术理论》(*A Cognitive Theory of Magic*, by Jesper Sorenson, 2007),也一直是符号学工作的领域。^① 认知符号学已经呼之欲出,延续至今的难产,只是让人更为期待。

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世纪前的意义理论前辈索绪尔、胡塞尔、瑞恰慈等人学到什么的话,那就是在热烈拥抱认知科学的同时,如何坚持人文学科的基本立场。这不是引用问题。洛特曼讨论过大脑的左右半球与离散型和混成型符号;雅克布森引用脑受伤位置引发失语症,来讨论双轴关系。这也不是反对符号学概念的普泛品质。我们说符号学是文科的数学,是一种说明其规律适用性的比喻,而不是真正要求符号学如数学那样精密。意大利符号学家莱昂(Massimo Leone)把这种符号学称作“硬件符号学”(hard-semiotics),他说:“人类关于神经生理学的知识无论发展到什么地步……即从系统上讲,神经生理学都不足以解释诸如语言、意义和文化等社会现象。”(莱昂尼,2014)即使有一天人类能够做到,将计算机与大脑成像解剖学结合,直接说明符号分类的原因,恐怕不能再称为文化符号学,甚至不能成为认知符号学,而是“脑神经符号学”。

形式理论,包括符号学、叙述学、意义哲学,不得不谨慎处理量化测试式的证明。可能风格学与修辞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验室化(例如修辞格的研究),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语言学的分支。量化证明往往极其清晰而有说服力,对于形式理论来说,这种诱惑是致命的,因为会取消思辨的质地和人文性质。

在拥抱技术进步的同时,认知符号学依然可以谨慎面对“时代潮流”。形式理论纠缠而复杂的论证,思考根本问题时毫不苟且的认真态度,与实验室方式对比,看起来就像“前科学时代”的治学方法。但是人文学科本身就是以文化为关注领域,而文化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是人类亘古未变的老问题。丹尼尔·贝尔很早就指出:经济-技术领域“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其中含义是进步”(1989, p. 59)。而文化不同,文化是“符号领域”,本质上是“反动的”,文化“不断回到人类生存痛苦的老问题上去”(1989, p. 41)。实际上,一百年来,符号学和意义哲学并没有把心灵、意识、意义等问题说得比前人更“清楚”,而是揭示出前人没有考虑到的复杂性。而认知科学的技术工具则是力图把心灵诸问题分解到最简单的元素,就心灵的奥秘得出一个可以在实验室里验证的清晰结论。

^① 2015年5月德国Muenster即将召开“魔术符号学研究”国际大会。

由此, 认知符号学, 不可能直接移用认知学的方式, 而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特有的思辨方法和论证方式。形式理论(意义哲学、符号学、叙述学、风格学)能够, 而且必须吸收认知科学的许多原理, 吸收认知科学对“注意”、“想象”、“记忆”等关键问题上取得的成果, 但是不得不对量化方法有鉴别。心灵问题的核心部分, 是超越量化的, 是无法在实验室里得到最终解决的。

因此, 我们应当拥抱认知符号学, 因为它给符号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但是对符号学的“认知科学化”, 最好保持一定谨慎。这是本文的一点建议, 这实际上也是整个符号学运动至今所持的态度。

或许更积极的办法是: 逐渐朝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文认知学”努力, 这样可以让符号学与“认知科学”拉开距离。这二者的一个重大差别可能是: “人文认知学”或许不会像认知科学那样统一于量化答案, 或许研究的结果是更加众声喧哗, 因为心灵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多元体。

引用文献:

- 贝尔, 丹尼尔 (1989).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胡壮麟 (2013). 我国认知符号学研究的发展. 当代外语研究, 2, 6—77.
- 李思屈 (2013). 当代符号传播理论发展的三种趋势. 国际新闻界, 6, 24—31.
- 莱昂尼, 马西莫 (2014). 从理论到分析: 对文化符号学的深思.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7.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史忠植 (编) (2008). 认知科学.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文艺报 (2004年12月16日). 从“形式”走向“认知”: 21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研究新转向.
- 艾柯, 翁贝托 (1997). 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赵毅衡 (2010). 诚信与谎言之外: 符号表意的接受原则. 文艺研究, 1, 27—36.
- 赵毅衡 (2011). 理据滑动: 文学符号学的一个基本问题. 文学评论, 1, 153—158.
- 赵毅衡 (2014a). 回到皮尔斯. 载于曹顺庆, 赵毅衡 (主编), 符号与传媒, 9.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赵毅衡 (2014b). 论二次叙述. 福建论坛, 1, 121—127.
- 赵毅衡 (2015). 意义的意义之意义: 论符号学与现象学的结合部. 学习与探索, 1, 121—129.
- 周枫 (2004). 从反心理主义到现象学的创立: 胡塞尔现象学创立之初的内在紧张性及其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3, 34—40.
- Alber, J. (2009). Impossible storyworlds—And what to do with them. *Storyworlds: A*

- journal of narrative studies* (Vol. 1), 1, 79–96.
- Brandt, P. A. (2004). *Spaces, domains, and meanings: Essays in cognitive semiotics*. Bern, CHE; Peter Lang.
- Bronwen, M., & Rinham, F. (2006). *Key terms in semiotics*. New York, NY: Continuum.
- Cobley, P. (2010).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London, UK: Routledge.
- Culler, J. *Structuralist poetics,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London, UK: Routledge.
- Fludrenik, M. (1996). *Towards a “natural” narratology*. London, UK: Routledge.
- Foucault, M. (2002).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human sciences*. London, UK: Routledge.
- Herman, D. (Ed.). (2003).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Stanford, CA: Publications of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 Petrilli, S.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Berlin, BRD: Mouton de Gruyter.
- Saussure, F. de. (1959). *Course of general linguistics* (W. Baskin, Trans.). New York, NY: Philosophical Library.
- Simonsen, J., & Vang, J. (2008). Neo-structuralism: Homage to Claude Levi-strauss. *Cognitive Semiotics*, 3 (fall issue), 66–98.
- Stephens, G. L. (1981). Cognition and emotion in Peirce’s theory of mental activity. *Transaction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Society*, 2 (spring issue), 131–140.
- Stockwell, P. (2002).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Whitehead, A. N. (1928). *Symbolism: Its meaning and effect*.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Zlatev, J. (2011). *What is cognitive semiotics?*. SemiotiX New Series. Retrieved from <http://semioticon.com/semiotix/2011/10/what-is-cognitive-semiotics/>.

作者简介:

赵毅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符号学与叙述学教授，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Author:

Zhao Yiheng, professor of Semiotics & Narratology of Sichuan University, director of the ISMS Research Team.

Email: zhaoyiheng2011@163.com